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创新机理研究

程 凯 吴大华

【提 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其本身也是根据我国国情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机理作为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本身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新的理性分析和理论探索。它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涵和实现机制，其所涉及到的创新审视机理、创新互动机理，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反思机理和前瞻机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发展的有机构成部分，对其理论本身的发展有一定的开拓视野的作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理论创新 创新机理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2)01—0035—07

一、创新机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涵和实现机制

“创新(innovation)意指创新的行为(innovate)、发明行为(invent)或创造行为(create)，从这个意义上说，机制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思想理论创新、经济创新、科学技术创新、知识创新以及社会事务等方面的创新都属于创新范畴。”^①早在1912年，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其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首先提出了以“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为特征的创新概念，此后，关于创新的研究逐步拓展，并率先成为管理学和经济学研究的热点。但创新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哲学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本质要求。从马克思恩格斯到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核心都非

常重视和倡导创新的思维方式，善于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和时势需要提出新的思想和理论，在各个历史阶段不断地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创新，创造出新的成果。

机理(mechanism)的本意解释一：是指为实现某一特定功能，一定的系统结构中各要素的内在工作方式以及诸要素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运行规则和原理。本意解释二：机理是指事物变化的理由与道理。具体涉及到创新机理，指的是在创新活动中各种创新要素的结构、功能及其内在关联，表现在创新过程中互相作用的运行规则和原理。其核心是创新，依托载体是其各要素的结构生成，

^① 霍福广、陈建新：《中美创新机制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其表现形式是创新过程中互相作用的运行规则和原理。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为了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不断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实际紧密结合,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首先,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客观需要迫使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斗争建立了新中国,领导人民走上民族复兴和共同富裕的道路,特别是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思想,这是在自己具体的国情土壤上结出的思想之花,而它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把自己的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这便有了反映改革开放时期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们都反映了中国时代发展的需要,都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正如毛泽东所说“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①所以,我们说没有创新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机理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涵和实现机制,其本身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前发展的规律之一。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审视机理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的内生机理与外生机理

在事物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创新的内生机理是指在事物内部,以事物自主创新系统为基础,以事物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周期为主线,事物内部各个组织、各种创新要素对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所起的作用方式。具体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的内生机理,是指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发展的各个内部组织、各种内部要素

和资源对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所起的作用方式。

学者徐松林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指在现代中国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和认识活动的人及组织,主要包括人民群众、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家和领袖五种类型的主体。^②作为执政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人,是创新思想的主体之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的内生机理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任何创新思想的诞生,归根结底都是由人提出来并由人具体地组织实施和宣传扩散。领导人根据国情与现实中提出创新性理论,并在实践中落实下去转化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转化为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和政策措施。这也进一步涉及到内生机理中的制度和机制因素,作为执政党的制度和机制如果能够保证领导人民顺利地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顺利地促进社会各项事业按照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顺利地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那么这样的制度和机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的内生机理中将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如我们党一贯重视的调查研究机制提高了党对革命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规律性认识,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科学基础,并促进党的理论创新。正如江泽民所说:“坚持调查研究,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要求,是党保持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重要渠道,也是我们党的一项基本工作方法和领导制度。……加强调查研究不仅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而且是一个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③党内民主机制使中央决策层集体领导制度推动着党的理论创新,并使党的理论创新在党内民主的基础上成为集中全党智慧的结晶。深度学习机制,以制度化的学习方式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中央政治局安排了几十场次的集体学习,不断研究新的课题,为理论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还有学术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页。

② 徐松林:《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求实》2006年第8期。

③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46页。

转化机制，党中央对理论研究工作的高度重视，使得学术界、理论界的研究成果能够经常性、制度化地转化为党的创新理论，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向前发展。^①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②

同样，创新的外生机理是事物外部的各种影响因素和各种资源如何作用于事物自主创新系统，最终促使事物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具体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的外生机理，是指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发展的各种外部因素和各种外部资源如何作用于它的自主创新系统，并促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如早期的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与中国的革命和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当时的日本渠道和苏联渠道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形成比较重要的影响，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苏联的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更是深刻，在各种主义思潮互相碰撞甚至激烈斗争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国情和革命实际发展的需要，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独创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的理论，以至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到毛泽东思想。但在理论表述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先后均有更改，原因是为了避免刺激苏联领导层。甚至在建国以后，苏联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仍然施加了一定的影响，以至于我们党的八大在党章中都没有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原因也是从和苏联搞好关系的大局出发。对此，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解释说：“为什么八大没有提毛泽东思想？也是因为苏联的关系。苏联始终拒绝承认毛泽东思想，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他们刊用的时候都给删掉。这成了一个禁区。”^③这充分说明外在因素和资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既有过积极的帮助传播作用，但在某些时候也有一定的消极阻碍作用。同时，也从反面启示我们：

作为一个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并且是上升到国家层面的理论体系，对外来文化的积极方面借鉴吸收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但一定要根据国情的实际需要和执政党自身的需求来理性地把握，既不能屈从于外来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压迫和束缚，以至于困住自己的手脚而难以发展理论，更不能忌惮于所谓的“国家友好关系”而使本该发展的理论故步自封；也不能因为外在因素的影响而失去理论创新发展的动力和良机。

所以，事物的内生机理与外生机理并非截然分开的，它们在机理系统内也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其核心都是基于事物自身发展的需要，并且为这种需要创造条件来促进它的发展。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的宏观机理与微观机理

作为一种不断创新发展的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可以从多种多样的角度来深入探讨，但从总体上来说，可以分为两种视阈，一种是宏观的角度从整体上来进行研究，这种宏观的视阈可以展示宏大开阔的视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的方方面面都展现出来，但这样也有明显的缺点，毕竟一个不断创新发展的理论体系是有精深而丰富的内涵和要义的，仅凭一篇论文或专著都无法达到揭示其全部要义的目的，也无法穷尽其所有的理论涵义和发展价值，总会有人不断地突破其理论的生长点来丰富和拓展其理论体系，因而难免有空泛之嫌。当然，如果能够从整体性的角度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研究得透彻，说理分析深刻，那也是一件幸事。但目前国内学术界能达到这种高度的研究成果却寥若晨星，学术之路依旧是漫漫长途，幸好人在途中。虽然是宏观的视阈可以展开，但不可否认的是任何宏观的构成都是微观的组合，所以另一种视阈从微观的角

① 辛向阳：《重大突发事件与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7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③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1页。

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的机理就显得数不胜数，很多学者正是从微观的角度来进行充分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归纳起来，从微观机理方面进行研究的有以下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关概念和内涵的剖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性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历程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点与规律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我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途径与方法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特别是党的领导人）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理论创新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教训的研究；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具体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前提和基础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根据和立足点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基本轨迹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基本方式与方法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内在机制与动力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标准与途径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主要成果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方法论的研究等等不同的微观角度。应该说这些不同的微观角度都是其微观机理的组成部分，都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来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不同风貌，也可以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学理发展，更重要的是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学术成果。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的反思机理与前瞻机理

自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以来，它在中国不同阶段的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不仅因为它是科学，而且是因为中国的社会和国情迫切需要这样的理论来指导；是因为它同中国社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发生了联系；实现了有机结合；是因为它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和

掌握。所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内在要求。正如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结合各个国家不同时期的具体实际，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具体化；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只有在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才能开辟自身的发展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发展就是这种应有之义的反映。

但是在这种应有之义中，我们要做一定的反思。第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发展的学术层面的反思。应该说迄今为止，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正在逐步深入和扩展，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也有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现状、问题和不足提出了反思。如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机制、标准等方面应反思的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是什么？究竟怎样结合才符合创新规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机制是什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创新机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如何化？怎样化才是科学合理的？影响这些“化”的因素有哪些？怎样才能避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偏差和失误？怎样才能避免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误解与误读？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方面反思的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体系结构如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特征是什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如何概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影响怎样？^②

第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治层面（或领导决策者对其功能层面）的反思。作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和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不可能不带有政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743页。

^② 陈金龙：《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若干思考》，《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2期。

治层面的功能和政治价值，而且这种政治功能和价值对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从整体上推进了中国历史的向前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具体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层面上，我们的理论已经发展到较好的阶段，国家领导人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也有很好的论述。在1980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① 30年后当温家宝总理在深圳考察时依然沉重而坚定地提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② 温家宝在总结特区经验时表示，要坚持改革开放，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他重提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指停滞和倒退会葬送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死路一条。尽管学术界对每一次的党代会召开或领导人高瞻远瞩的讲话都给予了积极评价和正面阐释，但从学理上来说，很多论文和著作都没有超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论述、党的文献的阐述，更多的只是停留在简单的叙述层面上，或做一般的通俗性宣传和解释，对一些理论性的内涵和学理没有做出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因此学术界要反思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会给中国的政治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前景？既然中国不会走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那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将给中国社会和民众提供什么样具体的政治发展路径？如近期具体的发展路径和远期的规划路径，或至少在学理上进行前瞻性研究。

第三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应用层面的反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怎样时代化？怎样大众化？或者说它是怎样“化”中国的？中国是如何马克思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过程中的关键是什么？应注意哪些问题？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的机制是什么？这些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实

际应用层面都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可能有的学者因此会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为什么要提出它的实际应用层面？这里面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一是它首先是从理论到实践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传入中国，理论的需要和中国实践的结合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这本身就包含了实际应用的功能。二是在实际中如何应用的问题。实际就是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如何转化的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的机制是什么？有历史记忆的人会更加重视这个问题，因为中国历史上把马克思主义当教条所造成的损失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也因为把马克思主义当神灵、把领袖当神圣几乎把中国引到崩溃的边缘，其实所反映的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应用的大问题。但英明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曾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实事求是。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发展前瞻性研究方面，首先应考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的学术层面的前瞻性研究，它主要着重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未来发展趋势，并在实践中不断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社会实践总是会呼唤新的理论，并与新的理论相结合。作为具有与时俱进品质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的实践中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社会中，只要不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或内部动荡，整体上应该都会处于这种渐进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要探索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会围绕中国社会如何完成现代化的进程来展开，并把探索现实性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未来，这同时涉及到中国社会发展战略层面的前瞻性研究，这就要求根据中国社会实践的未来发展趋势，“预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现代化进程中可能遇到的新形势、新问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176页。

^② 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12507443.html>，2010-08-22。

题,并根据这些形成新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发展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形成富有成效的、社会大众乐于接受和应用的理论发展政策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顺利实现。”^①只有这样的前瞻性研究才能高瞻远瞩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也能引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其中所涉及的前瞻性问题有:在中国现代化中后期或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如何外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现有的“中国模式”究竟是否可持续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在这种发展模式起着怎样的指导作用?中国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如何与世界对话和沟通?在这种对话与沟通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外化成文明的影响力有多大?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国崛起,究竟会给人类带来哪些正面的贡献?其中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会贡献哪些价值?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创新互动机理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的纵向互动机理——上下互动,重要的是内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的纵向互动机理,实际上是国内上下链条之间的如何互动。如在理论创新的途径方面,领导层要认真倾听人民的呼声,及时深刻总结实践经验,让创新理论来自实践,同时又回到实践中去。做到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让理论创新的源泉流淌在实践之中,流淌在主体的群众之中,并对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方法和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和理论概括,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所需要的活水源头。这一点在中国目前现实的政治架构中尤其重要,因为在上下链条互动的结构中,上层有绝对的优势资源和宣传、贯彻渠道,下层却处于相对的弱势或被动地位。即使下层是站在时代的前沿,有时也要冒着极大的风险,就如当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进行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尝试。在上下链条之间的互动中,学术界无疑是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他们既要进行自身命题的学术研究和创新,同时又要对社会的重大理论肩负着研究和阐释的责任,并且这种研究和阐释要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符合国

家重大战略选择的需要,还要面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宣传和解释说明,以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更好地接受和应用这种理论。这种作用似乎类似于各级党政官员,他们同样是上下链条之间互动的重要角色,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代表着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政府,以更直接的面貌展示着这些理论的转化和应用,群众也能从他们身上更直接地看见这些理论的本质,所以除了他们头顶的光环,还有他们也是理论的体现,因为他们就是理论和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和实施者。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理论上下链条的纵向互动中,他们的作用不可或缺。但在这种纵向互动中,特别要重视的是如何内化,既要把人民的呼声和需求内化成执政党的理论政策,又要把执政党的理论政策内化为人民的实践,同时要在各级党政机构中内化成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执行力、行动力,而不是偏移为背离人民和社会发展的羁绊。如何内化成时代需要的文化和先进理念,来引领时代发展,那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境界。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的横向互动机理——内外互动,重点是如何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外化成文明的影响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的横向互动机理,实际上是国内外之间的互动。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传入中国,并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社会不同的历史阶段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与此同时,作为已经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在向世界各国传播着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并对许多发展中国家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双向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极地吸收其精华,包括世界各国的文明精华,也包括积极有用的理论精华,让这些精华部分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并从中提炼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成分。更重

^① 聂金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4页。

要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经济总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国际地位也日益提高，“中国模式”的呼声也日渐高涨。同时，国外也必然更加关注中国的思想理论的指导方向和政治体制改革走向。那么我们在与世界各国的互动交流中，我们理应积极地把所形成的思想理论传播到国外，主动地介绍我们的思想内涵和理论品质，让他们了解到我们的思想理论是为了社会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是为人民谋福祉谋利益的，是为了世界和谐的，而不是为了世界霸权和威胁他国的利益。并且在双边和多边的国际协商机制中，积极主动地保持与他国

的对话与沟通，在涉及国家战略层面的利益活动中，要积极主动地参与进去而不是相反，让其他国家感受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国崛起的现状是对世界做出积极正面的贡献，如此，我们的思想理论才会“外化”成文明的力量，才会让他国接受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本文作者：程凯是华南理工大学思想政治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女子学院讲师；吴大华是华南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二级教授、法学博士、博士后

Study on Innovative Mechanism of Chinese Marxism

Cheng Kai Wu dahua

Abstract: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s such a course that combines the basic principle of Marxism with practice of Chinese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and opening-up, it's also a course of theory innovation according to Chinese conditions. It is an innovative mechanism which explores new conditions and new problems, and also an essential intension and realization mechanism that involve innovative scrutinized mechanism, innovative inter-dynamic mechanism, especially introspective mechanism and prospective mechanism which compose organic parts of Chinese Marxism. These studies play some important roles in expanding Marxism theory.

Key words: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heory innovation; innovation mechanism

观点选萃

财政投入不足直接导致校车事件的产生

陈卓

教育学博士、浙江警察学院社会科学部副教授陈卓在来稿中指出：

发生在我国农村地区的校车安全问题，直接原因在于财政投入不足，最后导致学校不合格校车、黑校车泛滥。如果政府部门不加大投入，仅仅在安全监管上做文章，其结果只有两个，一是学生、家长、学校、社会大家“遵章守纪”，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学生徒步上学，在城市还可以挤公交车，而在一些山区，则只能每天来回十几里甚至几十里跋涉；二是“严打”、监管风头过后，私车黑车死灰复燃，并逐渐泛滥，家长、孩子无法忍受长途跋涉之苦，出钱找私车送孩子，一切又恢复到原点。结合发达国家的经验，符合我国现实的选择是，对于中西部农村地区学校的校车，由中央财政统一出资购买校车，当地财政（省、市政府）负责校车日常运行经费；对于大中城市郊区学校的校车，由省财政负责出资购买校车，学校和家长分摊运行费用。在解决上述地区的校车问题之后，进一步从城市公共交通保障出发，将中小学校车纳入考虑。就校车而言，作为特种运输工具，如同消防车等公益特种车辆，校车的社会属性使其不能完全市场化，国家财政应该对此有公益投入。在目前的情况下，不管谁埋单，校车作为一种重要社会资源，已经没有什么疑义；从政府举措的力度和速度上看，解决校车问题，似乎已经刻不容缓。

(周勤勤 摘编)